

身处在旧大陆的文化走廊上，太过频繁的文化碰撞既促成了文明的早熟，又以文化冲突的形式撕扯着、牵绊着、阻碍着文明的前行，在中东历史舞台上走马灯般的出现和消失的任何一种文化——苏美尔、阿卡德、亚述、波斯等——都很难获得为发展出确定的文化身份所需要的较长时段的不受干扰的发展。因此，整体说来，中东自身很难发展出基于文化连续性的像轴心文明那样的文明成就，它在全球文明史上（至少早期文明如此）的地位是为三大轴心文明提供史前期（孕育期）的营养。

但在由中东文明哺育三大轴心文明的过程中，三大轴心文明后来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去神学化倾向：希腊的神人同形同性，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佛教走向否定神格的“无”以及纯粹思辨，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三星堆考古的特殊意义正在于它的成果特别有助于说明这个过程。

文明史家 Williams McNeil 曾生造了“微型寄生”（micro-parasite）和“巨型寄生”（macro-parasite）这对概念来解释早期文明的形成及形态。微型寄生指的是病菌、微生物等对生产者人体的寄生和营养汲取，巨型寄生指的是军队、官吏等世俗国家机器对生产者的剩余价值汲取。早期文明就产生于双重寄生之间此消彼长、动态互动的某个平衡点上。置于这个分析框架，中东



地区的特点是微型寄生程度特别严重，因此文明如果能在这里产生，就必然意味着它已经历史性地探索出了从根本上限制巨型寄生规模的方式，这个方式当然就是构成中东文明史特征的政教合一和无所不在（无论公域、私域）的神学控制。

三大青铜文明是中东之外最早接受中东文明的文明，这使它们接受的政教模式在微型寄生程度已大为降低的情况下，异化为另一种形态（神圣形态，以区别于世俗权力形态）的巨型寄生，表现为神学由教义传诵转向繁文缛节和仪轨主义，国力大量地用于礼器、神器的制造。同为青铜文明，三星堆的黄金美学（黄金面具与神鸟箔片）和青铜铸造/焊接技术都要超过后来的殷商文明，这只能解释为神学的推动。与此同时，世俗国家机器一如既往地抑制，米诺斯的城市都不设城墙，三星堆遗址也未发现实用兵器，1、

上图：这是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青铜纵目面具（3月5日摄）。

2号坑的61把铜戈过于单薄和柔软，无法投入实战。这种文明的强大与脆弱都在于此：强大体现在对信仰共同体内部的控制，脆弱体现在它无力对付来自共同体之外的武力冒犯。而且，它对内部的日常管控有多么无孔不入，它最终在对外战场上就有多么不堪一击。这解释了这种文化何以会在长期延续（基本都在千年左右）之后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整体地归于灭亡——哈拉巴文化是在整个印度河流域范围内同时灭亡的。而目前的主流解释，因为视域中没有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普遍诉诸自然灾害，比如洪水或地震（以及地震引发的海啸），但这无法解释这种灾难为什么没有在考古学上造成庞贝古城那种被突然降临的自然灾难（火山喷发）凝固了的生活，一处也没有。

如果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文明毁灭于外来征服，那么这种征服最核